

中国“人口转变”下的 增长与“双循环”发展战略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被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双循环”战略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人口转变”下的增长逻辑诠释“双循环”发展的必然趋势、理论逻辑和现实挑战,旨在分析中国如何打破对国际大循环的路径依赖,向“双循环”战略转变。中国必须通过国内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份额,促进消费;通过人力资本与创新效率的同步提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循环体系;对外要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双循环”战略。

关键词: 人口转变; 双循环; 人口红利; 人才红利; 社会投资; 汇率稳定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1) 10-0044-12

一、基于增长视角的中国经济“双循环”战略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要素流动、重振内需等视角研究中国“双循环”战略的成果丰富,本文的理论梳理主要基于增长的视野,希望把“双循环”理论纳入增长的分析框架中,提炼在新增长格局下的“双循环”增长动力机制,突破原有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路径锁定。当前国内外关于“双循环”战略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商品交换和资本交换。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了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交易,而后不断拓展,拉美国家的学者讨论了中心(发达经济体)与外围(后发国家)的不平等交易,发展出了基于生产价格和货币优势的“中心—外围”不平等国际交换理论。^① 基于全球投入产出体系形成的国际价值转移理论和实证框架,国内学者依据中国数据做了分析,^② 均揭示了不平等交换和货币权利特性。从增长的视角看,基于“中心—外围”理论静态研究资本与劳动的不平等交换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忽视了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剩余劳动与资本结合中的增长效应。中国吸引外资,与剩余劳动力相结合,进行“干中学”的技术模仿和扩散,实现了工业化的动态赶超,^③ 通过改革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实现了双赢;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形成了比较优

作者简介: 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 经济增长。

① 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 欠发达理论批判》,杨明柱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 冯志轩《不平等交换的历史动态: 一个经验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赵敏《货币低估、全球分工与国际价值转移: 理论与中国经验数据》,《世界经济》2021年第5期。

③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干中学、低成本竞争和增长路径转变》,《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势；通过加入 WTO 加快实现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摆脱了“贫苦陷阱”，即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机制设计能将资本与劳动要素的不平等交换转变为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消耗中国劳动力的国际大循环阶段即将结束，中国迫切地需要转向人才红利阶段，以压低劳动报酬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体系要让位于提高劳动报酬、促进消费、提升人力资本和企业创新效率为主导的国内大循环体系。在劳动收入、人力资本和创新效率同步提高的人才红利阶段，要改变劳动与资本交换的机制。

第二，关注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国际分工体系的产业交换与国际价值循环的路径。这一大类研究是国际贸易与增长研究的结合，突出了基于产业内交换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随着全球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各国产业的不断演进，国际贸易理论快速发展。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同质性厂商和最终产品交易内容被不完全竞争、异质性厂商和中间产品交换的特性所替代，基于中间品贸易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实践形成了所谓的“新新贸易理论”^①。产业间贸易逐步关联到了一国产业的价值链长度、位置提升、产业创新等方面，国内外学者在此做了非常多的创新性研究，包括：（1）测算 GVC 增加值^②，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体系，核算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的渠道；（2）基于投入产出中间品进出口与国内产业创新升级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中国在 GVC 体系下的“共轭循环”^③以及大国市场对新技术的诱导作用^④；（3）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测量与微观计量，包括产业长度、位置、外包、产业内贸易等，该领域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也是中国“双循环”战略研究的重点；（4）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国通过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开发，推动后发国家的发展和产业转移^⑤，相关研究关注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对于延长中国产业生命周期的影响^⑥以及中国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的国际治理等。

第三，基于重振国内市场与国内结构的讨论。很多学者特别讨论了以中国为主的循环协调、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 NVC）主导与国际价值链主导的不同过程、以国内为主推进国际大循环。^⑦也有研究更集中于大国模型的空间开放^⑧以及基于大国模型的宏观管理体制问题。^⑨还有学者专门讨论国内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⑩，关注结构转变、创新和产业升级。^⑪

第四，讨论更广泛的国际与中国互动的政治关系、贸易制度与全球治理、累积成本、资本流动和汇率等问题。许多基于 GVC 的研究涉及货币、累积成本、税收、制度质量、国际价值链治理、贸易体制等变量，并进行了模拟计算。如有学者基于 GVC 探究了人民币、累积成本的影响^⑫以及全球规则和治理、贸易体制对中国的影响。^⑬资本流动与汇率对贸易影响的讨论成果也非常丰富。此外，还有关于地缘政治和空间布局对贸易影响的诸多讨论。

① 杜大伟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② Robert Koopman, Zhi Wang, Shang-Jin Wei,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 No. 2, 2014, pp. 459-494;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③ 洪俊杰、商辉《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循环论”：理论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④ 郑江淮、郑玉《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

⑤ 张平《“一带一路”：中国“开发优先”跨国区域合作的探索》，《学习与探索》2017年5期。

⑥ 李文溥、王燕武《“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经济研究参考》2021年第4期。

⑦ 凌永辉、刘志彪《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⑧ 欧阳峤《新发展格局下大国经济开放空间构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3期。

⑨ 张平《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国模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变》，《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

⑩ 张平、袁富华《宏观资源配置系统的失调与转型》，《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5期；张平《创建“消费—创新”新循环——2035经济新主题》，《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

⑪ 袁富华等《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⑫ 倪红福《全球价值链中的累积关税成本率及结构：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⑬ 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本文主要是从增长阶段和“人口转变”双重转换的动态角度去考察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的路径、体制和战略切换的关键变量,通过国际比较试图说明内在的机制。希望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集中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增长与要素循环特征和内在逻辑的分析,破解中国国际大循环的路径锁定,使其切换到经济“双循环”的道路上。本文更关注经济增长阶段和“人口转变”下劳动—资本要素分配、扩大国内需求和提升创新效率的国内新循环系统。

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加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后,国际大循环对劳动份额的抑制限制了内需的提升。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企业积极嵌入GVC生产网络,显著降低了其内部劳动力要素的收入占比,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加入复杂GVC比加入简单GVC对中国要素分配有着更强的负作用,比国内中间品协作对劳动份额的压制强度更大。^①政策上强调市场结构性改革,提升人力资本的匹配效率,提出了借鉴“社会投资国家”为导向的福利体制转型,将社会投资更多地用于人力资本,推动国内人口红利快速转向人才红利,形成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提高的逻辑,推动产业升级,并积极推动中国与国际的要素和产品交换,参与国际治理,逐步形成国内为主和国际循环互动的“双循环”格局。中国摆脱基于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道路锁定,最需要的是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实现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而当前国际不断变换的不确定性冲击正好为“双循环”转换提供了契机。

每次外部冲击对出口导向国家都是一次国内结构性改革和再平衡的机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中国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房地产、土地新政,促进了城市化发展。2008年中国历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外经济进入第二次再平衡,开启中国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加速了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2020—2021年暴发新冠疫情,随着疫情和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全球供应链基于“安全”再调整,中国将迎来第三次再平衡调整。中国在此次再平衡调整中,需要积极地切换增长路径,提升劳动分配份额、加大社会投资的福利支出、重振国内需求、加快累积人力资本、提升创新和生产效率成为了路径转换的关键。增长路径的转换需要市场结构性改革,特别要重视“人口转变”这一发展新特征,重点要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改革,并同时推进宏观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以改革促进新的再平衡。

“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内生性问题,中国迎来了以人力资本为目标的人才红利的新发展阶段。通过提高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加大社会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有效劳动力市场匹配转换,提高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发展的效率补偿,形成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新循环。本文从不同阶段下要素收入分配入手,分析如何形成和提升劳动报酬—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创新效率补偿的逻辑,探索以国内循环为主推动“双循环”转型的关键变量和增长路径。

二、中国人口、经济发展双重转变下的“双循环”发展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变包括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人口转变”。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农业与轻工业结构调整时期;第二阶段是1993—2008年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第三阶段是2009—2017年金融危机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发展,向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逐步转型时期;第四阶段是2018年后,随着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加之2020—2021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放缓,全球供应链再调整,中国经济借全球经济再平衡之际全面转向“双循环”战略的新阶段。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和即将进入的人才红利发展阶段。“人口转变”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变,从压低劳动报酬、高

^① 袁媛、暴建红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前向生产链长度的测算》,《产业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消耗劳动力的国际大循环模式转向以提升人力资本和创新水平为主的人才红利阶段，增长与循环模式必然要进行重大调整。

1. 人口转变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转变”包含了人口总量和结构的转变。中国劳动人口的总量 2013 年见顶，2014 年呈现负增长，就业人口总量 2014 年见顶，2015 年呈现负增长。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中国低生育率 2024 年见顶，中速生育率 2031 年见顶。从年龄转变看（见图 1），1990 年中国劳动人口（15—64 岁）占比为 66.7%，2000 年达到 70.2%，2010 年达到顶峰 74.5%，而后逐步下降到 2020 年的 68.6%，而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 13.5%，老龄化加快，中国的人口红利阶段行将结束，即将进入人才红利阶段。

在人口红利阶段，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等制度变革，依靠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与国际资本相交换，通过国际大循环成功地走上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逐渐步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正准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口结构的转变改变了增长要素的禀赋优势，中国的增长方式也随之调整。中国的经济循环方式要从以消耗劳动力为基准的国际大循环，转向以重振内需、提高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国内循环，同时利用人才红利和科技创新来提升国际大循环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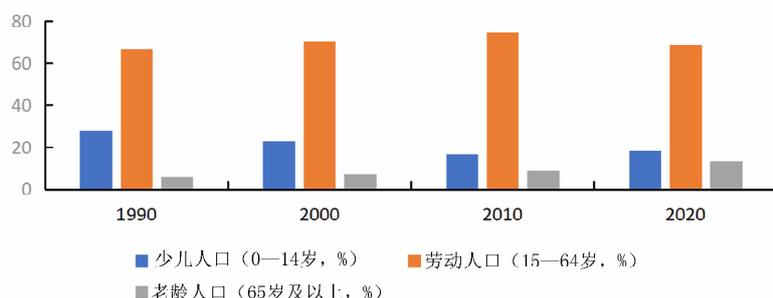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

数据来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2. 价值循环转变

中国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直接反映了经济价值循环的转变。从图 2 可以看出，第一，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推动了贸易盈余不断上升，贸易盈余占 GDP 的比重也不断上升，2007 年达到顶峰，国际贸易净额占 GDP 的比重在 2007 年一度达到 8.7%，而后逐步下降，到 2019 年国际贸易净额占比已降至 1.1%，通过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渐行渐远；第二，吸收外资的资本形成占比大幅下降。外商直接投资（FDI）净额占 GDP 的比重在 1993—2007 年高达 4%—5%，2007 年开始逐步下降，直接投资净额也降至 1% 以下，资本输出与外商投资趋向平衡；第三，海外收入净额始终为负。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及私人外汇流出在海外形成了大量资产，但海外收入净额为负，相对日本海外收入占 GDP 比重的 3%—4% 以及德国、美国 1%—2% 的正收益，中国的投资效率不高，获得海外要素投资的正回报难以汇回国内进行投资并获得收益；^① 第四，金融投资净额主要是由央行主导将累积的外汇资产以金融投资的方式购买美国、欧洲、日本等储备货币国债券。2015 年 8 月 11 日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中国一时对外金融投资流出很快，而后随着债券通等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证券投资组合流入加大，金融投资净额始终为负。

从图 3 可以看出，中国已经从净利用外资的国家转为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平衡的国家，而且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资本输出国，即不论是对外投资流量和海外资产存量都是全球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中国

^① 陆江源、杨荣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推进国际循环》，《经济体制改革》2021 年第 2 期。

加入 WTO 后的 2002 年对外投资 27 亿美元，同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527.4 亿美元，经济发展依然以国际资本与国内劳动要素为主导。2005 年人民币升值，中国对外投资上升到百亿美元，到 2014 年，对外投资突破百亿美元，2015 年汇率改革，2016 年对外直接投资高达 1967 亿美元，高于 FDI 的 1200 亿美元。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到 2019 年对外投资回落，中国已经从净资本流入到资本进出平衡，如果按更广义的口径，加上民间资本流动的口径，中国已经是资本净流出。从资本的流向看，中国大量资本已经倾向于国际化投资。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是同步的，这是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消失后的规律使然，如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转向东盟，东盟承担了中国的产业转移和贸易转口的双重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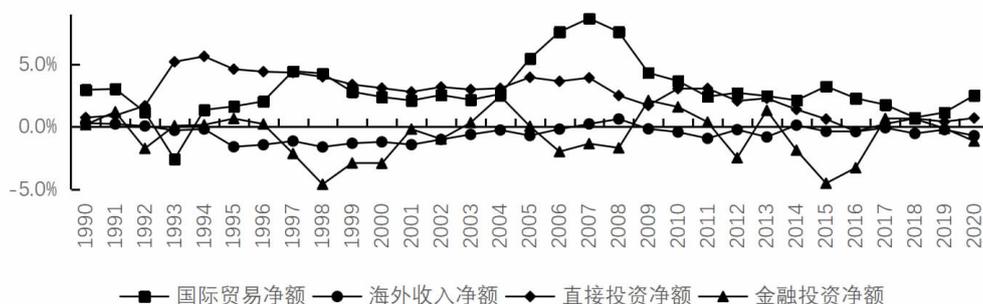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国际收支占比变化趋势

说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国际收支平衡表，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陆江源博士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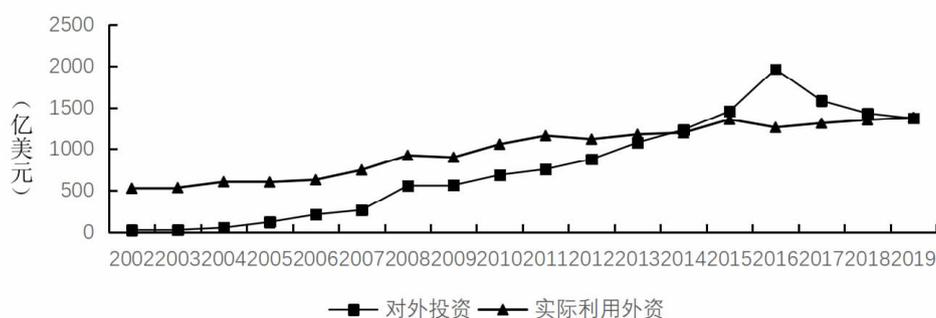


图3 走向平衡的中国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

数据来源 《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年。

从资本和贸易的价值环流可以划分清晰的发展阶段，2008年前由FDI和贸易顺差主导；2008年后资本和贸易双顺差主导逐步下降，实现平衡；2010年后，中国资本探索如何走出去，在国际上寻找发展空间；2015年后，资本对外投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基本平衡，中国继续对外投资，并带动产业转移；2020年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供应不足，中国有力地把握了防控疫情和供应链完整的优势，推动了贸易盈余提升，但全球疫情稳定后将再度进入全球供应链再调整，中国依然会保持贸易盈余水平，但这已经不是新的带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投资并没有海外收入的汇回，没有获得对外投资的国际交换的利益，反而对外投资处于损失状态，这是需要改进的。

从商品和资金循环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进程从加速到当期已经趋于平衡，这与“人口转变”高度相关。中国经济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正在逐步让位于“双循环”战略。但中国经济对原有的国际大循环道路依赖性强，如果不能有效调整，将会形成战略性冲突和扭曲。

3. 需求转变

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加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按“生存成本”发放工资，有10年左右的时间农民工工资未变。中国经济对外通过消耗廉价劳动力和压缩劳动报酬的方式大幅度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取得了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比较优势。这种压低国内劳动力报酬占比的方式直接降低了

国内购买力，主导了中国人“勒紧裤腰带拼命出口”的内外需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高度关注中国GDP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按照白重恩和钱震杰利用31个省份的数据测算结果，劳动收入份额占比在1995—2006年从59.1%逐年下降到47.3%，相应地，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8个百分点。^①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依据2018年普查进行调整，得出2018年劳动收入中初次分配收入比为52%。根据资金流量表公布数据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偏高，高于基于资本弹性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即1-资本份额）。张车伟和赵文做了雇佣与自雇的差异解释，并用超越对数的生产函数比较了理论值与现实值，指出雇佣经济劳动份额低于GDP中不区分雇佣与自雇（如农业生产者）的劳动收入占比。^②从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和学者修订的数据看，二者趋势相同，且与发展阶段特征相吻合。劳动报酬的收入份额与GDP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的走势存在一致性趋势（见图4），即劳动报酬下降必然会引致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初次分配影响了消费者的支出能力。按2018年的资金流量表看，财产收入占居民部门收入的比重为7%，居民储蓄为7.7092万亿，负债为7.8514万亿，居民持有现金、债券、股票和保险等财产，储蓄与负债基本持平。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上看，居民主要依靠劳动报酬，住户部门初次分配后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后的住户可支配收入低于初次分配劳动报酬。2018年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住户部门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9万，比通过家庭住户调查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万高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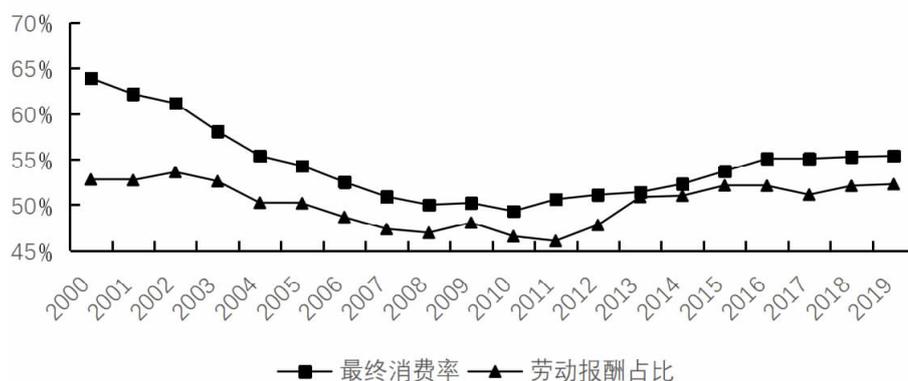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与最终消费占比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劳动份额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计算。

劳动收入份额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较长时间内出现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推动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城市部门只需要以稍高于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就可以吸引足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此时城市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幅高于农业部门，造成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其数量逐步减少，劳动份额逐步上升。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资本支出大幅上升，2008—2011年劳动报酬占比到达谷底后，随着中国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人口增长趋势的转变，劳动报酬份额逐步上升。

2010年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达到顶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些“人口转变”现象直接引起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③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由降转升，带动了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增加和消费比重上升。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劳动报酬占比稳定，企业更依赖资本替代劳动，这就需要深入到产业升级的角度去看资本与劳动的要素配置情况。劳动供给负增长、劳动收入难

①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张车伟、赵文《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基于雇员经济与自雇经济的测算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③ 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以进一步提升,这对中国重振内需、实现以内循环为主的路径转换是一个很大挑战。

4. 要素扭曲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2001年加入WTO,国际大循环战略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通过招商引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等方式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接收国际产业的转移,出口贸易额不断加大,国内工业化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转移,“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快速扩散,国内资本积累加快,促进了国内市场需求容量扩大,形成了国内自主品牌和有竞争优势的产业。1997年的个人住房按揭、1999年的公房改革、2002年土地招拍挂等措施加速了国内城市化的步伐。到21世纪初,已经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双推进的循环体系。产业结构方面,形成了工业国际国内双环流、国内服务业大发展的局面。199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2%,2006年达到历史峰值42%,而后到2011年此数值一直超过40%,这是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加速增长和赶超的阶段。2012年后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降低,到2019年工业占比32%,服务业占比高达53.9%。中国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结构转向了制造业与服务双轮驱动的经济结构。

当前中国面临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大任务,以劳动—资本要素扭曲即压低劳动要素报酬,转向了劳动—资本在不同产业中配置的扭曲。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可以得到中国各行业资本、劳动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通过反事实估计,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可获得44%的产出增长。^①从56个行业的情况看:其一,劳动扭曲下降,资本扭曲上升。劳动扭曲的产出损失从加入WTO后的2002年峰值22.0%,一直下降到2014年的10.7%。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资本扭曲损失从2000年的22.8%一直上升到2014年的33.5%,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大量资金集中堆积到金融与房地产业;其二,制造业效率不断提高,扭曲不断减少;而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扭曲损失较大;其三,资本扭曲,特别是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成为了2008年反危机的重要工具,服务业的发展主要靠金融和房地产推动。中国的金融、房地产、批发贸易行业的扭曲消除分别可以带来9.7%、4.6%、4.5%的产出增加;其四,劳动扭曲来自管制,中国同等受教育者的收入方差比美国和法国大得多,工作安排与技能相关度低,教育回报作用小,特别是城乡户籍、服务业的行业管制等都造成了“好”工作岗位与技能不匹配。

Meng等基于GVC比较分析了1995—2005年中美通讯行业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中国主要依靠资本,依然是“干中学”的技术进步,高技能人力水平份额提高缓慢;而美国驱动该行业发展的因素是人力资本,而非资本投入,劳动报酬份额上升快。^②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很多论文讨论了劳动技能升级路径和传统产业中不断过度利用低端劳动力的不同发展范式。^③中国当前依赖资本,而不是升级劳动技能和提高劳动报酬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笔者也做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机制不畅的研究。^④

微观的扭曲表现在近年来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反映了中国资本扭曲导致效率下降的基本特征。本文依据世界银行的佩恩表(PWT)9.1版本的国别经济增长数据库提取资本产出比,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已经达到5.7,美国则长期稳定(见图5)。资本产出比不断提高说明了当前在技术进步贡献不足,劳动力数量增长下降的条件下,只能靠负债提高杠杆率的方式形成资本,而资本产出效率不断下降,这种依靠资本累积模式维持增长是难以持续的,而且会全面加剧资本配置扭曲和资本要素在行业中的配置扭曲。

^① 陆江源等 《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② B. Meng, M. Ye, S-J. Wei, "Value-added Gains and Job Opportunit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DE Discussion Papers*, 2017.

^③ 加里·杰里菲等 《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和政策分析》,曹文、李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④ 张鹏、张平、袁富华 《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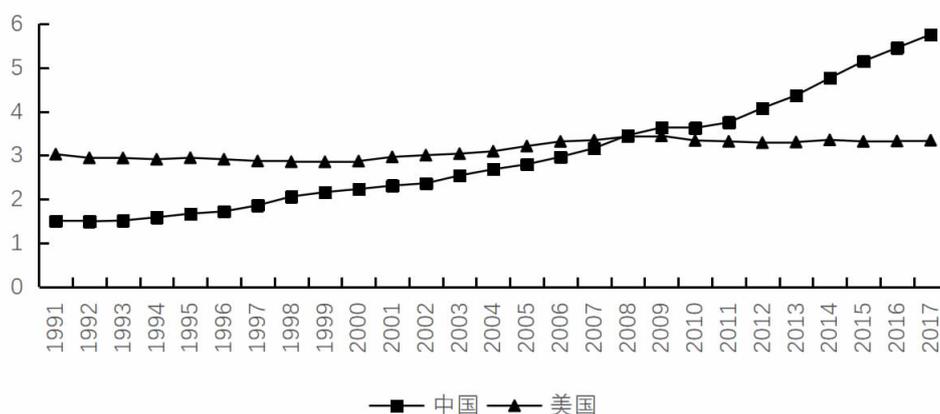


图5 中美资本产出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的佩恩表中的资本存量与产出的国别数据。

从要素结构看，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要素配置扭曲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资本要素扭曲背后的产业更集中在金融、房地产；而劳动扭曲则体现在受管制的科教文卫体等服务业上。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受阻于要素扭曲。随着收入和城市化率的提高，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是必然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不可分的，服务业是制造业提高效率、价值和创新的根本。从企业微笑曲线看，制造企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包括技术研发、外观和品牌设计、管理、分销、数字化等，外部存在供应链管理与物流、金融服务等一整套提升附加价值、创新价值和竞争能力的服务。为了保持竞争力、技术创新和获得高附加值，制造业必须依靠人力资本密集的方式，实现整体产业升级。提高消费服务业的效率受到了公共服务的行政管制，科教文卫体发展不足。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依然缓慢，TFP 贡献也没有上升，这说明中国产业升级不足，服务业竞争力不强，特别是金融与房地产业的资本扭曲，提高了整体产业的成本，阻碍企业的创新能力积累。人力资本高的劳动力集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其教育得不到市场回报激励，创新受阻。人力资本提升与效率提升相关度下降，阻碍了技术创新。

中国国内循环应该不断提高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支出的比重，并通过人的“人力资本”提高来进行创新，获得效率补偿。中国转向人才红利，自主创新是根本，需要持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市场机制与创新更紧密的结合，提升产业效率。

5. 资源配置方式转变

中国在 1993 年开始建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资源管理体制，与国际大循环匹配。1978—1992 年完成了国内工业的调整，贸易盈余很少，不稳定。1988 年王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国际大循环理论，然而参与国际循环导致逆差大，顺差小，1993 年出现了 70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1993 年中央着手于宏观体制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转型和稳定物价。1994 年后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宏观体制，包括人民币汇率并轨，1995 年后贸易盈余稳定向上，实行分税制改革，激励地方进行工业化并与中央分成，推出商业银行法，央行货币供给转型为基于外汇占款的货币供给方式，产业和贸易政策上积极推动招商引资，形成了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管理体制。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开启了大规模城市化和服务业大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循环体系逐步从单一的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了“孪生”的宏观体制。^① 随着汇率市场化定价的成功，中国已经向“双循环”的宏观体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并没有建立起与此匹配的国家信用以及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供给等宏观体制，出口导向的产业、贸易等激励机制依然主导了政策导向，增长的路径依赖被体制锁定，出现了内外循环的体制安

^① 张平 《创建“消费—创新”新循环——2035 经济新主题》，《文化纵横》2020 年第 6 期。

排性冲突。

从压低劳动力收入与高资本回报的国际循环体制转向以人力资本提升与创造效率的国内循环为主的模式，需要推动中国国内市场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管理体制的转型，打破国际大循环导向的体制锁定，激励高质量发展的“双循环”战略的实施。

三、“人口转变”下发展转型的逻辑与实证

从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看，当一国经济从摆脱贫困，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并向着发达经济体过渡时，人口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上升快，人口老龄化加速，可以说，“人口转变”几乎由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内生决定。“人口转变”带来了各国发展路径的转换，大量的发达经济体从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和创新为主，其关键性要素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相匹配的是劳动报酬的提升，进而会促进消费和创新，提升劳动效率，之后再次提升劳动报酬，形成了国内循环与创新效率提高的互动循环，保证一国的战略转换，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和贸易顺差，并通过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获得国际净收益的国家价值循环。

中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继续压低劳动报酬维系国际大循环不可持续，提升广义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已经是必然选择。同时还要消除资本的扭曲，特别是降低金融与房地产业的扭曲带来的效率损失。中国通过汇率并轨贬值的方式推动了由内向外的转换，但再采取人民币大幅升值来切换显然是不妥和高风险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定价机制逐步完善，降低了人民币波动，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福利化转型是必然选择。依据生产函数核算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数量负增长下的增长转型必须走人才红利的道路，提振国内需求，提高对广义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与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创新效率。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一国的增长模型包括四个因素：资本与劳动要素分配比例，即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增长率或可换算的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教育年限的增长）；资本增长率；技术进步（TFP）。

本文将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并将劳动投入分为劳动力供给量 L 、劳动力质量 H ，将其引入生产函数中，宏观生产函数设定如下：

$$Y_t = A_t K_t^\alpha (H_t L_t)^{1-\alpha} \quad (1)$$

模型中 A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K 代表资本存量， L 代表劳动力供给量， H 代表劳动力质量。取对数，将其转换为增长率形式：

$$\ln \frac{Y_{t+1}}{Y_t} = \ln \frac{A_{t+1}}{A_t} + \ln \frac{K_{t+1}}{K_t} + (1-\alpha) \left(\ln \frac{H_{t+1}}{H_t} + \ln \frac{L_{t+1}}{L_t} \right) \quad (2)$$

上式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率=TFP增长+（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力质量）增长*劳动份额+资本供给增长*资本分配份额。在这里，教育年限增长率代表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指标，就业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计算。

本文认为，增长核算中影响中国增长的最大变量是“人口转变”。因为劳动人口、就业人口数量相继转变为负增长，如果没有劳动供给的调整，基于生产函数的核算不可行，经济增长模型要求劳动供给增长非负。

劳动供给增长等于劳动力数量供给的增长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增长率用教育年限增长率来表示。劳动力数量的供给直接用就业人口来衡量。1979—2009年教育年限数据取自于

对学者^①计算数据的估算,按文中数据教育年限增长率是平稳的,与其他学者计算的人力资本增速^②相当。2009年中国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为7.41年,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2010年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为9.08年,2020年达到9.91年,但没有给出每年的数值,本文均取各年增速作为人力资本的增长指数,按国家统计局可以计算出2010—2020年均增长0.88%,本文设定2010—2017年均人力资本增长率为0.88%。1979—2017年的教育质量按年均增长进行计算。劳动增长以教育年限增长率乘以就业人口进行修订,而不是用年限值直接乘以就业人口,与模型设定略有差别,但对教育质量数据不同来源的处理则更平稳。依据世界银行的PWT表给出的产出和资本存量,本文做了计量回归(见表1),计算出中国1979—2017年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536%。分段计算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458%,与统计局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基本吻合,说明中国资本产出弹性明显回落,本模型进行了人力资本的调整。资本分配份额下降是劳动力数量供给下降的必然结果,资本收益份额在国内会不断降低,这与剩余劳动人口高峰时高资本收益份额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

表1 中国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1979—2017年)

变量	1979—2017年	2009—2017年
Ln(K/L)	0.538*** (0.00)	0.458*** (0.0000)
Adjust-R ²	0.994	0.959
F统计量	5593.546*** (0.0000)	163.37*** (0.0000)

说明:表中括号内的数值为P值。中国的产出和资本存量等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PWT表9.1版本的国别经济增长数据库,人力资本利用教育年限增长率乘以就业人数计算获得。

资本产出弹性的变化与“人口转变”高度相关,中国当前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稳定,总人口数量保持正增长,就业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一致,可代表劳动供给的增长趋势(见表2)。

表2 中国“人口转变”与劳动人口、就业人口的负增长

年份	总人口	劳动人口 (15—64岁)	就业人口 (亿)	人口红利 (%)	劳动参与率 (%)	就业增长率 (%)	教育年限 年均增长(%)
2010	13.4091	9.9938	7.6105	74.5	76	0.36	0.88
2011	13.4735	10.0283	7.6196	74.4	76	0.12	0.88
2012	13.5404	10.0403	7.6254	74.1	76	0.08	0.88
2013	13.6072	10.0582	7.6301	73.9	76	0.06	0.88
2014	13.6782	10.0496	7.6349	73.4	76	0.06	0.88
2015	13.7462	10.0361	7.6320	73.0	76	-0.04	0.88
2016	13.8271	10.0260	7.6245	72.5	76	-0.10	0.88
2017	13.9008	9.9829	7.6058	71.8	76	-0.25	0.88
2018	13.9538	9.9357	7.5782	71.2	76	-0.36	0.88
2019	14.0005	9.8910	7.5447	70.6	76	-0.44	0.88
2020	14.1178	9.6776	7.5064	68.5	78	-0.51	0.88

说明: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每年0.88%的增长率分摊到各年,用来修正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的人口数据来自于第七次人口普查。

以劳动消耗型的国际大循环战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转入以人力资本驱动的知识经济阶段,中

① 宋家乐、李秀敏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投资》,《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② 王小鲁、樊纲、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国需要走获取人才红利、强化人力资本与提高创新水平的内生增长道路。“双循环”战略适应了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但这一转变有很多的路径依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克服很多挑战。^①

发达经济体大多遇到过出口导向与国内为主的战略模式的变换,其基本经验包含如下几点:一是国际贸易竞争逐步转向国际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并大幅度延伸服务体系,深度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德、日、美等国家净海外要素收入为正,对本国福利是一个重要的收益补充。产业转移释放了国内的要素过度累积,通过资本与后发国家进行劳动交换,获得额外的资本回报,提升了本国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保持了贸易顺差,并通过治理体系深度地参与了国际价值链体系;二是在国内进行市场结构性改革,提升国内需求。德国推行以社会投资(SIP)为基准的社会福利转型,在原有的福利国家体系下基于对教育的全方位投资,带动国内人力资本提升。日本也做了相应的福利制度改革,提升国内需求;三是在汇率由市场决定的基础上保持稳定。汇率定价是一个调整内外需求的关键变量,但其副作用很大,所以汇率升值不是提升内需的好路径,它对刺激国内资产泡沫的作用大于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如日本在汇率升值时强行内外切换,导致资产泡沫和停滞。德国则通过欧元区的发展,降低升值压力,保持汇率稳定和内外平衡,使贸易顺差持续提升,保证了财政盈余,成为内外发展的典范,还承担了欧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责任。

中国实施“双循环”战略的关键变量和动力机制是要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进行国内市场结构性改革,配合宏观管理体制变革,逐步探索建立一个基于大国模型的宏观体制。

1.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从鼓励“走出去”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一直在尝试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中国以更多的实物资本输出为后发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再开拓产业—贸易转移,形成了中国的产业转移道路。在基础设施投入带动下,中国开始推进中国工业产业园发展,如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贸易重要的出口地,通过投资、产业、贸易和治理参与链接国际价值循环,形成了更高水平的开放。

参照国际发展的道路,企业发展与国家资本配套资金是加快循环的关键,中国海外资本上升很快,但海外净收入仍没有取得正收益,说明在国际化效率拓展上依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服务业体系的国际化延伸是跨国发展的最重要方面。中国应积极鼓励互联网企业在全世界扩展,并形成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这不同于原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分工的全球价值链发展路径,是中国发展的新特色,需要更多的产业政策支持。

2. 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国家社会投资引领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要靠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来提升教育年限,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年限的提升要有助于微观效率的改善,即教育回报率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机制和企业研发转化机制上,使员工保持终身学习的激励和企业创新的激励。当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时,首先推动的是劳动力市场体制的改革,使人才与企业高效率匹配。

中国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主要以初级劳动为主,形成了相对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但存在着“低端锁定”的就业形态。高端服务业以科教文卫体等现代服务业为主,但人力资本的密集主要体现在信息和通讯产业上,其就业容量有限,依然是非完全市场化主导。广义人力资本的高端服务业受到行政管制,供给缓慢,效率也不是以市场效率为主导,人力资本堆积与无效率共生,未能形成产业效率与人力资本聚集的同步。中高技能者、退休员工再就业等市场机制不成熟,效率很低,原因在于管制和退休福利制度的羁绊,要改革形成体制,放松对广义人力资本的管制,加强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消除劳动要素在服务部门的扭曲。

^① 张平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变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演进机制构建》,《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关系到“双循环”战略转型的核心，涉及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以及“劳动份额—消费—人力资本—创新和效率”的新循环。因此中国这一阶段的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它既包含了基于工业化过程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又包含了如何通过新的社会福利模式鼓励人才成长、在职培训、退休再工作等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提升。这方面应借鉴德国主导的社会投资体系，其核心是“建立社会保障，能更加充分和可持续地投资于人的技能和能力，支持员工度过他们一生关键时刻”^①。

“社会投资国家”旨在通过社会投资于教育、在职培训、终身教育等，推动国家向知识经济转变。社会投资有助于人们适应社会挑战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避免陷入贫困。“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是对“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传统福利制度的改革和重新定位，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年的投资，主张国家、个人和集体在面对各类风险时要积极承担责任，共同参与社会福利的供给。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社会投资的理念，引领教育投资，推动劳动力从数量向质量转换，平衡财政能力，减少老龄化带来的过度负担，推动中国建立公共福利体系，促进人力资本的消费与供给，促进劳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提升劳动效率。

3. 稳定汇率与重建大国宏观管理体制

中国利用汇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汇率市场决定下的双向波动，实现了成功的转换。未来保持稳定就是最好的策略。汇率的稳定为国内宏观资源配置战略转换提供了时间窗口。国内宏观资源配置战略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设立的小国模型，主要特征是以外汇资产为抵押的发行，财政、产业、贸易等宏观管理与政策都围绕着出口展开。2008年后经过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个“孪生”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但根本性特征依然是激励国际大循环的战略，货币供给、财政和产业政策没有摆脱原有制度的设计特征，对国内循环有着明显的制度羁绊。^②

重新建立基于大国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核心就是重建国家主权信用，形成中国国家信用资产，货币发行从基于外汇资产逐步转向基于中国国家主权信用资产的发行。^③建立国家主权信用需要对现有的财政体系进行改革，包括税收、中央地方关系、财政支出、社会福利目标等。但是仅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形成与大国信用相匹配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这样才能推动中国货币供给体系的转变，从基于外汇资产的货币发行转向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发行，形成大国特征的国家宏观管理体制，推进相应产业、贸易、金融政策的发展。

责任编辑：孙中博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Social investment: Commission Urges Member States to Focus on Growth and Social Cohesion—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2013.

^② 张平、袁富华《宏观资源配置系统的失调与转型》，《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5期。

^③ 张平《货币供给机制变化与经济稳定化政策的选择》，《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7期。

ABSTRACTS

“No Violation”: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Confucian Filial Piety Theory

Feng Bing Zhang Xiaodan (20)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o violation” i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Zhu Xi’s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which basically runs through the whole system of his filial piety theory. Zhu regards reasoning and courtesy as the object of “no violation”, but both of them are internalized in the heart and recognized and applied by the heart. Therefore, Zhu especially emphasizes that both are not contrary to the heart of parents nor the heart of the son of man’s love and filial piety. Thus, he takes them a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for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In this mechanism, “harmony” is not only the core value concept, but also constitutes the practical principle of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emotion and reasoning together with “the Mean”,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model of Zhu Xi’s theory of civilization.

China’s Growth Based 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Zhang Ping (44)

“Dual circulation”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nevitable trend,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challenges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from the growth logic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iming to analyze how China breaks the path depend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domestically China should adopt structural reforms to increase labour share and boost consumption, to construct the circular system with domestic major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 through the simultaneous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ternally, China needs to deep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so as to implement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